

萨尔玛，一位印度女诗人的艰辛传奇

■水心

近日正在国内院线上映的印度电影《印度合伙人》与此前热播过的《厕所英雄》，都不约而同地涉及印度农村女性题材，两部电影的男主角也颇有相似之处，都是“宠妻狂魔”，为了让妻子过上更卫生、更体面的生活不惜挑战传统，其中最艰难的步骤都是“改变人们尤其是女性自身的观念”。两部电影的结局都皆大欢喜，一个成为登上联合国演讲台的发明家，另一个化身助力莫迪总理“清洁印度”项目的民间模范。有趣的是，在两部电影的设置里，争取女性权益的英雄都是三观正确的丈夫，而非女性自身。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一个印度底层女性不幸没有遇到开明的丈夫，她该如何是好呢？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和一名印度女性学者聊天时，她得知我对诗歌很感兴趣，便推荐我看看印度女诗人萨尔玛的作品，“她的诗歌非常特别，和那些住在空调房间里的诗人完全不一样。”我便找了些资料来看，果然，萨尔玛的传奇经历，完全可以拍成一部宝莱坞大片。

萨尔玛 1968 年出生在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一个乡村穆斯林家庭。12 岁那年，村里来了放电影的，她和三个女同学偷偷跑去看，没想到那是一部情色片，等到开始放映后，电影院门被锁住了，她们无法离开。家里人知情后，把她软禁在家九年，不允许她继续上学。萨尔玛早早结婚生子，在她人生最青春美丽的年纪，感受到的却是亲人的疏离、父权的压抑和内心的孤独。强烈而庞大的感情迫使她拿起笔，开始写诗。“当我提笔写下脑海里的句子时，我觉得我正在和某些人分享自己的感受，这种感觉促使我继续写下去。”为了不让人发现，她的许多诗歌都是在浴室中偷偷完成的。

萨尔玛在诗中描绘印度底层女性的切肤之痛，她们的爱、孤独、母性、自我、性别意识，以及精神的匮乏、孤独的煎熬和自我的拷问。她在首小诗中描写蚂蚁搬走一只被压扁的蟑螂的残肢，而她马上意识到眼前的景象正是自我的巧妙呈现，因为她也有“再也无法飞翔的翅膀/无用的双腿”。在另一首题为《没有留下痕迹》的诗中她写道：“身穿白色纱丽/未曾生养的老妇/无尽的孤独/什么样的底所会留给一个女人/她的痕迹已全然抹去。”萨尔玛的诗简单、紧凑，并不像一些诗歌那般深奥莫测，却善于展示女性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的悲哀和危险。她的诗没有多余的幻想，只有个体与现实撞击后活生生的回响，显示出执拗的尊严感：在父权的文化背景下依旧试图发出女性个体的声音，拒绝抹杀个人记忆。守护者视其为异端，而更多批评家和读者认为她是泰米尔女性主义文学先锋。她说：“我的痛苦并非个人的，它属于所有女性。”

她将自己的诗偷偷送往出版社，选择“萨尔玛”作为笔名。她依然若无其事地生活在村庄中，出版社帮她接收读者来信，再秘密打电话将大致内容告诉她。由于当地穆斯林妇女不能单独外出，每次参加出版社举办的文学活动，萨尔玛只能以看病为名，在妈妈的陪伴下偷偷前往。在第一部诗集发布会上，出版社邀请萨尔玛上台说几句话，她却不敢登台，因为害怕发布会的照片会登在报纸上而被村里人看到。

事情发生了奇妙的转机。2001 年，村里的“潘亚特”迎来选举。“潘亚特”字面意为“五人长老会”，是印度乡村传统自治机构。由于当年村里的选举名额保留给女性，原本准备参加竞选的萨尔玛丈夫无奈之下只得让妻子参选。为了赢得选举，萨尔玛公开了诗人和作家身份，结果顺利当选。政治地位的变化为萨尔玛争取到了写作自由，她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写作、出版、收发杂志和信件，终于可以大胆暴露自己的政治态度。她接受电视台采访时不戴头巾，在社交媒体上称自己为“无神论者”，并于 2006 年加入反对党德拉维达进步联盟，积极为女性争取更多政治权利。

萨尔玛的故事诚然励志，但毕竟凤毛麟角，印度又有多少普通女性可以凭借天赋成名、再转型为政治领袖呢？事实上，早在上世纪 60 年代，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就当选印度总理，成为世界政坛上为数不多的女性领导人和蜚声海外的“印度铁娘子”，但精英层的光环与底层的阴影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时至今日，政治权利受压抑、经济缺乏独立性、思想意识陈旧仍束缚着数亿印度普通女性，层出不穷针对女性的恶性事件更让印度饱受诟病。即使在现代社会，由于多数女性婚后无法工作，她们被视为靠丈夫养活的累赘，出嫁时娘家不仅要负担各种婚礼花销，还要支付一大笔嫁妆，否则女儿在婆家的日子便不会好过。以至于一个印度朋友曾非常不解地对我说：“听说你们中国人结婚男方得出

好多钱，还得买房子才行，这是真的吗？真是不可思议啊！”

或许只有从经济基础入手，实质性地改变印度女性的处境和地位，才能从源头消除厕所、护垫、嫁妆等一个又一

个让她们遭遇尴尬和不公的问题。《经济学家》杂志 2018 年数据显示，在 G20 国家中，印度女性劳动参与率仅高于沙特阿拉伯，女性对经济发展贡献率为 1/6，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如果印度能充分释放女性就业潜力，其富裕程度将提高 27%。但充分实现女性就业并非易事。且不论文化传统，仅就现状而言，印度国民经济重心在第三产业，而软件、医

药等优势产业无法像制造业一样提供大规模就业岗位。在青壮年男性尚无法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女性就业不仅涉及女性权益，更是牵扯到印度经济结构转型的重大问题。



印度年轻女性学习女子防身术，以便在性骚扰等恶意事件中具有一定的自保能力。

视觉中国

“出生即悲惨”的一生

■本报记者 吴雨伦

最近，一项汤森路透基金会的报告将印度列为了全世界对女性最危险的国家之一，这引发了印度政府的不满。报告显示，印度被排在阿富汗、刚果(布)和巴基斯坦之后，成为全世界对女性第四危险的国家，其中在性暴力、贩运人口、文化与宗教三个项目中，评分最低。该报告指出，从印度首都德里到无数的小镇和乡村，数以百万计的妇女可能生活在危险之中。

印度政府认为报告存在严重错误。同时，《印度时报》指出，西方媒体一直以来恶意中伤印度，不顾该国人口基数庞大的事实，刻意放大负面社会现象。尽管如此，由于长期的历史和传统原因，印度女性地位低下却是不争的事实。

在印度国宝级演员阿米尔·汗的访谈节目《真相访谈》中，其中有一集内容为妻子八年内被迫流产六次，只因怀上的都是女孩。这就是印度女性悲惨一生的起点：从在母亲肚子里的那刻起，就面临被选择的命运。由于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观念，过去 30 年中，印度因流产而“失踪”的女孩子多达 1200 万。

自上世纪 70 年代胎儿性别检查技术问世后，印度人口的性别结构开始出现巨大变化。1971 年，印度 0 至 6 岁儿童的男女数量比为 964 比 1000，1981 年为 962 比 1000，1991 年为 942 比 1000，

■水心

在印度电影《神秘巨星》中，少女伊西娅的母亲娜吉玛常年遭受家暴，尽管她对丈夫唯唯诺诺，百依百顺，但稍一拂意，哪怕是菜里少放了点盐这样的小事，也会引来一顿打骂。伊西娅一家住在独立公寓内，父亲有体面的工作，算得上是中产阶级，但即使是中产主妇，娜吉玛也没有勇气主动离开丈夫。伊西娅为提高母亲离婚胜算，不惜苦苦相求孟买知名律师，离婚需要这么费劲吗？是的，这正是当代印度的尴尬现实：离婚，尤其对于女性，是一条过于艰辛的漫漫前路。

在中国，离婚只要去民政局办手续即可，一章盖定，速战速决，以至于“闪离”屡见不鲜。在印度却要面临经济、法律和文化等方面的问题。首先面对的是经济独立问题。鲁迅先生说得好：“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娜吉玛出走以后，如果遇到自谋生路的能力，终究要退回到家庭中。《经济学家》杂志 2016 年数据显示，印度妇女就业率仅为 26%，超过半数妇女认为没有家人或丈夫的允许她们不

2001 年为 927 比 1000，而到了 2011 年，这一数字变化为 914 比 1000。

印度家庭不愿生育女孩，其中主要原因是恶名昭著的嫁妆问题。在印度，女方父母为筹备嫁妆陷入贫困的情况并不少见，而若对嫁妆的数量或价值不满，男方家人又常对新娘暴力相加。为禁止这样的风气，印度政府曾于 1961 年颁布《禁止嫁妆法》，但面对根深蒂固的陋习，此法犹如一纸空文，“嫁妆致死”案件在印度至今屡见不鲜。由于嫁妆问题的存在，在印度，生女儿无异于自寻经济负担。甚至印度不少诊所曾借嫁妆问题鼓励人们流产，这些诊所的广告通常只有一句话：“现在花 500 卢比（堕胎），将来省 50000 卢比（嫁妆）。”

如果有幸出生并健康存活，一名印度女孩的成长经历也是风险重重，甚至被认为“生下来更加不幸”。印度适龄儿童没有好的教育条件，尤其在偏远地区，女孩很难完成八年法定教育。而童婚现象在印度仍然盛行。调查显示，22.6% 的女性 16 岁以前结婚，44.5% 的女性 16 岁至 17 岁间结婚，2.6% 的女性不到 13 岁结婚。

另外，根据德里社会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印度 15 岁至 49 岁的女性中有 35% 曾遭遇家庭暴力。另一组证明印度女性家庭地位较低的数据则来自联合国世界儿童状况报告，该报告称，印度女人平均每周要花 35 个小时做家务、看孩子、照顾病人和老人，而男人只花四个小时。

即便印度女性识字，甚至上了大学，

她依旧不那么安全，因为印度强奸案频发。从 1971 年到 2012 年，印度国内强奸案的数量增长了 8.7 倍。2012 年新德里发生了震惊全球的黑公交轮奸案。就读于德里大学医学系的 23 岁女大学生，在与男友看完电影回家时，误上了一辆不在当班的公交车，公交车上七名男子将其男友围殴后关押在驾驶室，然后将女学生拉到车厢后轮奸。

因为这一案件，印度于 2013 年通过《刑法修正案》扩大了对“强奸罪”的行为定义，强化了对性侵犯、窥阴、跟踪行为的惩罚力度。此外，当局还在其他微小的方面推进改革，比如新德里警方在公交车和三轮车上安装了全球卫星定位追踪系统。然而这些工作并未阻止强奸案接连发生。印度国家犯罪统计局发布的报案记录显示，2014 年的强奸案数量为 36735 起，为 2012 年的三倍。

据印度《经济时报》报道，性暴力犯罪正在阻碍印度经济崛起，如果让更多的女性参与工作，到 2025 年印度的 GDP 总量可以增加 7700 亿美元。但事实是，2015 年至 2016 年，只有约四分之一的印度女性在工作，这一数据甚至低于 2005 年至 2006 年的 36.3%，在 G20 国家中是最低的。大量的印度女性选择离开职场，或者长期从事薪水较低的工作，以此避免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受到威胁。

世界经济论坛去年发表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显示，印度下降了 21 名，在 144 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 108 位，主要原因就是印度女性就业率太低。回顾

这份报告，目前，许多印度女性仍然承担着传统性别角色的负担，这些角色将她们限制在家里，或迫使她们同时承担多重责任，使工作成为额外的负担。

对于有工作的女性来说，莫迪政府将产假从之前的 12 周延长到 26 周却也滋生了一些坏处。调查显示，有多达 180 万女性可能因为福利的扩大而失去工作，因为初创企业和公司不敢雇佣女性。而且，印度政府没有采取行动解决女性政治参与度不高的问题。数据显示，按各国议会中的女性人数来算，印度在 188 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 147 名，女性议员占比 12%。然而，讨论了 20 多年的《女性席次保留法案》仍未通过，该法案规定在人民院和邦议会中为女性保留三分之一的席次。

印度一家人权观察组织指出：“新的法律出台、新的计划启动……然而更重要的还是社会接受女性拥有权利且认可女性的权利应当被保护。”诚然，就如美国新闻媒体 Quartz 指出，最重要的问题是印度女性的传统地位几乎没有改变，父权制仍是女性面临诸多苦难的根源。虽然现今的印度在国家立法和司法方面对妇女地位的重新定义和表述程度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可深深烙印在普通民众思想里的传统观念却远非一朝一夕能改变的，就连阿米尔·汗也沉痛地认识到，“在印度的文化中，女人是没有权利的。”

漫长的印度式离婚

能出门购物，甚至有 52% 妇女认为女人私自出门遭受丈夫殴打是理所应当。家庭妇女惟有仰仗丈夫喘息生活，财务和精神自由则无从谈起。《神秘巨星》中，娜吉玛连给儿子买小零食、小物品只能靠丈夫睡着时偷藏一点私房钱。在另一部反映家庭妇女生活的电影《印式英语》中，女主角同样失业，但做得一手好甜食，靠向邻里朋友出售甜食攒钱，日积月累，居然攒出了到美国后参加英语学习班的培训费。无怪乎 2016 年莫迪一夜之间宣布废除流通中的大额卢比时，第二天各大银行前便有不少焦虑的家庭妇女排队“以旧换新”。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在北方邦、拉贾斯坦邦、比哈尔邦等妇女就业率极低的地区，离婚会对女性产生更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风气也更加保守。

假如下定决心离婚，则需要走法律程序。1984 年，印度通过《家庭法院法案》(The Family Courts Act)，打算离婚的双方必须通过“家庭法院”裁决，起诉离婚的原告不仅要交纳诉讼费用，更要付出巨大的时间成本。

首先，需要经过六个月的“等待期”才能进入法定程序（这项规定在 2017 年 9 月终于被印度最高法院废止）。

好不容易盼来开庭，便进入了个人与法律体系的持久战中。由于法院法官、速记员等人手不够，加之审理过程冗冗，案卷堆积如山，许多案子不得不悬置，通常一场听证会结束，要等好几个月才能等来下一场。如是便陷入了恶性循环：案子拖得越久，审理的办案人员越可能易其其人，新来的办案人员需要重新研读案卷，导致案子拖得更久。一位印度法律界朋友曾告诉我，在印度完成一件离婚案拖个两三年很正常，她经手的离婚案最长长达 12 年。

效率低下的离婚司法体系源于印度文化对婚姻的保守态度。在印度传统观念中，婚姻不仅仅是一项法律协定，更具有宗教化的神圣意味。两人结婚不是选择了彼此，而是命中注定属于彼此，是基于前世的深刻联系、在神的见证和认可下完成的严肃仪式，相扶相守自然成为必然的职责。“离婚”这个概念是现代印度社会被动接受的外来观念。《家庭法院法案》直言不讳：该法案的目的是“促进调解”和“维护婚姻”，婚姻中如果一方想离婚而另一方不想，那么提出诉讼的一方必须证明另一方存在“通奸、家暴、遗弃或精神异常”。至于我们习以为常的

“感情破裂”“三观不合”等，均不能成为离婚理由。

奇怪的是，印度教徒离婚如此艰难，印度穆斯林却保留了一项流传千年的离婚陋习，即男人只要向妻子大喊一声“talaq”（阿拉伯语的“离婚”），即可完成休妻。这种完全无视女性权益、践踏女性尊严的做法在很多阿拉伯国家均被禁止，但直到 2017 年 8 月，印度高等法院才正式判决这种做法违法，应予禁止。

我曾在印度当地报纸上读到一个真实的故事：泰米尔纳德邦一名印度教妇女 55 岁时提出离婚，这个年纪的女人提出这样的要求，令法官们都匪夷所思。他们好心相劝：“既然你已经和他生活了大半辈子，为什么剩下的时间不能继续忍受呢？”言下之意，Hard(困难)模式都过来了，Normal(正常)还是个事儿吗？她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解释，之前一直隐忍，但等孩子们都成家后，她感到有必要真正为自己而活着。案子拖了 10 年之久，这位坚韧的女性终于重获自由身。这个黑色幽默故事终于有了一个具有希望意味的结局，当事人说：“我想要的是尊重。”

一周封面



《经济学家》12月15日

富豪如何投资

排除中间商赚差价的“家族办公室”已成为亿万富翁更有效率的投资方式。“家族办公室”这个概念诞生于 1882 年，但在本世纪出现爆发式增长。原因是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富豪们对外部的资产管理公司丧失信心，从而转向“家族办公室”。目前，美国、欧洲及亚洲发达国家拥有 5000 至 10000 家“家族办公室”。不过，“家族办公室”的崛起可能引发三个后果：危及全球金融稳定；放大富人对经济的影响力；它比普通投资者更有特权获取信息、交易和税收计划。



《政客》12月14日

新一代的科赫领导人

今年五月，美国科赫家族的第三代族长查尔斯·科赫聚集 20 多位年轻富有的专业人士，在科罗拉多州的韦尔市度假一周。不过，和父辈传统的科赫聚会不同，他们很少提及政治。7 月，查斯的父亲，82 岁的查尔斯·科赫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举行政治捐助会议。这两场风格迥异的集会暗示着共和党金主的未来走向，过去该集团像是个“影子政党”，花费数十亿美元来影响政治；但近两年这一数额锐减至 4 亿美元。查斯表示，政治不是他热衷的，他将专注于社会生活。



《财富》12月

2019 年投资指南

《财富》杂志的专家向读者介绍了明年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将出现的创新与机遇。他们认为，美国参议院将与众议院开展农业法案、移民改革、基础设施法案的修订；特朗普·梅会在工党的帮助下赢得“脱欧”协议议会投票；沙特王储会逐步淡出外交和防卫领域，将主要精力放在内政和经济问题上。

一周数字

102.68 比索

明年 1 月 1 日起，墨西哥最低工资将从 88.36 比索（约 30.36 元人民币）增至 102.68 比索。这次“涨薪”是墨西哥 1996 年以来最低工资增长幅度最大的一次。墨西哥新总统洛佩斯承诺提高工资，幅度与通货膨胀水平保持一致。

1219 家

英国在 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9 月的一年内，共计 1219 家餐厅倒闭，比上一年多近四分之一。行业不景气，与英国消费者因为脱离欧洲联盟前景不明而“捂紧钱包”相关。在“脱欧”不确定性和利率升高的影响下，消费者似乎打算勒紧裤腰带。